

西方慈善救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分析

任云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摘要: 开埠通商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西方思想和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慈善与社会救济领域,通过早期出洋考察的学人、士绅和官员的传播和思想先驱的鼓吹与倡导,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吸收了西方国家近代先进的济贫思想和实践经验,充实和扩大了慈善救济的内容与对象,使慈善事业有了近代公益事业的特征,树立了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和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富国养民思想。

关键词: 先驱者; 西方慈善救济思想; 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章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07)05-0428-04

近代开埠以后,随着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不仅有许多外侨进入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而且许多国人也有机会出洋考察,尤其是士绅官员出国考察和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的鼓吹与影响,促使国人开始反思传统慈善和救济思想的局限,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慈善和救济实践的弊端,积极宣传和鼓吹近代先进国家的济贫做法,吸取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诸多先进的慈善救济理念。

一、西方慈善救济机构的组织形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学人、士绅、官员开始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和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最早的有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游历欧洲,1868年志刚、孙家谷出使泰西。之后,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不能不对中国有所触动和影响,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慈善救济制度、机构等内容不在少数。如志刚在出使泰西时,就已注意到了美国的育婴堂,李圭则更为详尽地介绍了纽约育婴堂的情况:“育婴堂屋共一百余间,间各宽敞。现在男女自初生至七八岁者约600名,有时多至3000人。每楼设十六榻。每二榻相并,一卧二婴儿,一卧乳媪。帷帐、被褥、衣裤俱洁净。厨房、浴室亦然。”^[1] 1868—1869年出访欧美的同

文馆学生张德彝的美环游记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育婴堂、孤儿院和类似救济院的机构。在纽约的一个岛上,“周数十里,四面花园,中建大楼数十处,养郡内孤独无告之人。”但对这些人并不是单纯的收养,“子女教以针黹,男子教以兵法。男女各有读书燕息之所,饮食衣服,一律周备。每楼同居者年龄相等,如8岁与8岁居,10岁与10岁居。”在另一个岛上,“广建园圃楼房,养疾病残废疯呆之人,百方疗治,愈则送归,男女皆然。”另外,还描述了华盛顿的一个收养200余名儿童的育婴堂^[2]。清末出洋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则对美国芝加哥的疯疾及贫民院、居留院做了详细记述:“疯疾者,分别男女及病之轻重而异其院。男院管理皆男役,女院管理皆女役。其年老而病较深者,别为一院。”对于病重者,“女或为长袖而束于腰际,男或以革带缀其腕。”病稍轻者则以休养为主,可读报、下棋,或安排“从事织室、面包制造室”劳动。收养贫民子女的芝加哥居留院则是由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士筹建的,该院有房10所,有议事院、书楼和游玩所,已收容7000名儿童。戴鸿慈的结论为“自兹以后,儿童不患无谋食之地矣。”^[3]

对于工业革命发生最早的英国济贫慈善事业,在这些出国游历者的笔下则有更丰富的描述。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对英国的养民之政做了详尽的描述。这种养民之政包括设立养济院、施医院、老儒会、绣花局

收稿日期: 2006-12-16.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基金资助项目(TJSKRG0501).

作者简介: 任云兰(1964—),女,副研究员,renyl2004@eyou.com.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义塾等。对于老幼、孤穷、废疾和异方难民,皆借大房院居之,“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4];对于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讨,而是“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饘餐,驱以除道造桥诸役”^{[4] 15},仅在伦敦就有1300余所^[5]。对于读书的寒士,由老儒会将米肉送到家中;对于家道中落、不能自贍的世族妇女,则由绣花局组织她们绣花以自养;对于得病无钱医治的贫民则由相隔数里设立的施医院对其实施救治,设在泰晤士河边的施医院有“广厦8所,皆5层,每层各小屋十数间,……每所相距约三四丈,中通以桥”,以使病人“舒息其间”。“男女各自为一室,衾履、衣裙、饮食、药饵皆院中代备。老者、幼者,以图画器玩娱之。或制几安四轮于足,使凭之以自行。”^{[4] 70, 134, 147}对于“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都会乡镇各有义塾,自数所以至数十所,每所延师数人以至十数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学徒皆居宿于塾,供其衣服,饮啖,不听他出。”^{[4] 191}也有由富人出资购买船只,收留这些街市上的贫儿,设立监督教习水师,两年艺成后分派到商船上充当水手,“使得自食其力”^{[4] 152}。

此外,这些出国游历者还对法国的育婴堂、德国、丹麦、瑞典的贫民学堂做了介绍^{[2-3] 137, 161, 184, 190}。1869年在巴黎的一所育婴堂里,张德彝观察到“楼房百间,间间整洁。”在门墙上有一转桶,以往有因贫穷无力抚养或不愿抚养者,皆可将婴孩包裹停妥,送置桶内,以纸书写其生辰和乳名,将桶一转,桶底的铜铃声就会提醒堂内人将婴孩抱入收养。后来转桶取消,人们直接将婴孩送入堂内。收养6年后,如果父母想领回孩子,则必须按年偿还代养孩子的衣食费用。育婴堂的孩子长到一定年龄男要充兵,女则贸易,所得皆归官方^{[2] 161}。至于各国的贫民学堂,基本上大同小异,男女生同校,由教师教授地理、博物、国文、物理、音乐、缝纫、手工、图画和木工等各科,设有活动操场,有的还设有免费浴室,提供免费饭食。这些贫民学校的共同点是,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接受职业教育,以使学生长大后有一技之长,实现自立自养。

在这些记述中,涉及到养济院、养老院、育婴堂、施医院、疯人院、贫民院、居留院、义塾及相关慈善机构。记述者对救济院、育婴堂等救济机构的宽敞、洁净和整齐优美的环境印象深刻,对这些机构除“养”之外的“教”之道也有所提及,即使“疯人院”对病稍轻者也安排劳作;对于其经费来源,也有考察,如有由富人独力担当者,有由官绅富民凑集者,有通过辟地种花养鱼、或通过演戏、杂耍获得门票收入以补贴不足者,还有通过抽租筹集经费的。尽管有的游历者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解释这些慈善实践,但他们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

佩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俗之美。

二、近代慈善救济思想的确立与传播

思想是行动的先驱。任何激进的改革行为都是在思想先驱的导引下完成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而周到的济贫措施与设施,促使中国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救济事业中的不足与弊端。

太平天国朝政的思想家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关于社会改革的方面,提出了要建立跛盲聋哑院、鰥寡孤独院、育婴堂等社会救济机构的主张。这只是一个轮廓式的设想,但并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计划。

思想家冯桂芬也在阅读大量西学书籍后,完成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政论性文章。在《收贫民议》中,他介绍了荷兰的养贫局和教贫局,在那里“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廩之而已。……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而瑞典国则强迫年轻人入小书院学习,否则会触犯刑法。在考察两国的做法以后,冯桂芬建议在全国各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严教室”收留“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教之以“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另外,应设立“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3年保释。”对15岁以下者不读书,15岁以上者不习业,“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以期达到“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在冯桂芬看来,民穷为匪,是地方“不教不养”的结果,如果“坐窃贼以流徙,即为远地之窃贼,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那么“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6]在这里,冯桂芬不仅强调善堂的养育功能,更强调善堂的教育功能,这种教育也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做人之道,还包括谋生技艺的培训。这种慈善思想已经蕴涵了“教养兼施”的先进理念。在这位兼经世思想家和洋务思想家于一身的士人看来,即使是“蛮貊”,如果其法合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为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和制度的引进奠定了基础。

薛福成从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机器养民说”,在他看来,发展机器工业,可以“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功,”“所成之物必多矣。”那么,“商务有不隆盛,民生有不丰厚,国势有不勃兴者哉?”而且“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必可分其余润以养吾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

有不可思议者矣!”^[7]也就是说,发展机器工业后,必然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他们所获利润仍归中国,不会外流,而且还可以使国内的贫民有工可做。

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也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首先对中国当时的善堂经理不善、经费不足的事实提出了批评,并根据游历西方士绅和官员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针对西方人将遗产捐赠慈善机构的善举,他感慨万千:“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他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如此可收一举数善的社会效果^{[5]525}。他反复强调要兴建工艺厂,多收养穷民,“授以一艺,则国无游民”^{[5]481}。至于费用,他建议由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他认为,每年迎神赛会敛资万千,这些“无益之费”,不如用于社会救济事业,“教养贫民”。他还认为,应由地方官从上提倡,好善绅商任劳任怨经理其事,上下合力,才能促成其事。他还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导人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之功可以赞化育,救济之事可以参天地。有财者当济之以财,无财者当济之以力。”^{[5]43}

此外,他还建议地方官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容乞丐,“或使之耕,或教以织。虽跛脚、盲目,亦有所司,称其力之相宜,俾令自食其力。”组织身强力壮者,到边疆开垦荒地,让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这样做既可以使边疆不致荒芜,又可为国家增添税饷。“如此泾渭攸分,贫有所归,病有所托。”^{[5]23}

改良派思想家陈炽也在《庸书》“善堂”中分析了中国的情况,提出了仿行西方国家举办善举的主张,他说:中国“自睦姻任恤之典废,而贫穷乏绝之患多,直省间有善堂,而杯水车薪,迨何以济?措施无具,董劝无方,三古遗规,渐灭尽矣。”“彼泰西诸国之善举,法良意美,规制精详。”^[8]不过,他在文中所列举的八项善举明显受到了游历西方各方人士的著述的影响,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陈炽思想中与慈善最有关系的部分是其提出的救济灾荒的思想。在他看来,通过所谓的“居”与“行”,即发展机器工业和通过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运输灾民到边远荒蛮之地和外洋是解决人民贫穷和救济灾民的有效途径。他认为,发展机器工业,可以使“有业者改图,无业者有业”。如果“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向日之手工糊口者,亦可免艰难困苦、忧冻啼饥,咸得享豫大丰享之福也。”^{[8]229}此外,他对改善仓储制度的观点、对兴修水利的看法、对西方城市中火政、水会、保险制度

的介绍都对当时的慈善和社会救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他的大同社会里,成年男女自由婚配,妇女怀孕后,即入“人本院”,也就是“胎教院”由政府赡养。婴儿出生后,即交由社会公养公教,进入育婴堂,6岁进入小学院,11岁入中学院,16岁入大学院,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大学毕业后,根据其专长和爱好,分配到各个不同部门,为社会服务。若有病或因工作致残受伤,即可到医医院接受治疗。人到老年即60岁以后可以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一旦去世则报考终院,由社会安葬。人死后遗产归社会所有。这样,每个人从出生时起就属于全社会,受社会抚养教育,然后服务于社会。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首对人类公理、正义、平等、自由的赞美诗,不免带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也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他认为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20岁为止,……20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则不须他人之照顾;设不幸者半途蹉跎,则50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在《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一文中,他对俄国人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在幼年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读书;在壮年的时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没有事业;到年纪老了的时候,国家便有养老费。”^[9]孙中山所崇尚的“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1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孙中山还从制度层面做了种种规划,在《建国大纲》中,他明确提出,要将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利之利,都收归地方政府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9]570}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体现了民本主义,其思想来源既包涵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也蕴涵着西方国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三、近代慈善救济思想的特征分析

在这些早期出洋考察的学人、士绅和官员的传播和思想先驱的鼓吹与倡导下,近代中国慈善救济思想吸收了先进国家的济贫思想和实践经验,发生了深刻变化,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征。

(1) 慈善与救济的内容与对象有所更新和扩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与救济内容仅限于育婴、恤嫠、养老、施棺、舍药,主要对象是社会上极端贫穷和处于弱势的人群,如孤寡鰥独贫民和废疾贫困之人。近代以后的慈善和救济事业明显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慈善救济机构的影响,将源于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慈善理念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融合,更新了近代慈善救济内容,加进了慈善教育和慈善医疗的内容。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救济对象也有所扩大,不仅仅限于对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具有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动的特征。虽然古代中国也有义塾和施医舍药的传统,但它们与近代意义上的大众化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涉及的人群面更大,救济的程度也有区别。

(2) 树立了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传统时期,慈善救济机构对收养人员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办法,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救济和施棺抬埋,而很少在对他们收养的同时,传授一些谋生的技艺,以使其能够自立自救。这种办法积久生弊,使被救济者产生了依赖心理,助长了他们的懒惰习气,有失救助者公平天下的本意,使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失之偏颇。近代以后,许多游历西洋的人士首先认识到,单纯的收养只能使受施者饱暖一时,而教养兼施则使其饱暖终身。因此,近代慈善机关一改传统做法,从单纯的收养转变为教养兼施。传统中国也并非完全排斥教养兼施的救济政策,如明代吕坤的养济院政策中实际上已有让受助者自食其力的理念,但他的养济院政策“对以鳏寡孤独政策为中心的国家救济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即使是在他任巡抚的山西省也没有真正推广开来^[11]。直到近代开埠以后,教养兼施的理念和做法才真正在慈善救济事业中得以贯彻和实施。

(3) 赋慈善救济于发展经济中。晚清这些先驱者,或有兴办洋务的实践经验,或有出使西洋的经历,这些实践和经历,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的根因在于实业不振,“养民无术”。为了从根本上发展经济,

解决贫困问题和民生问题,他们提出了种种通商互利、振兴实业、兴修铁路、开采矿山、“富国养民”的救济理念。如王韬的“持商为国本论”,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说”,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和郑观应的“商战固本论”。薛福成还强调应该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建造铁路,扩大人民就业门路。陈炽也提出了多开设工厂、救济贫民的建议。总之,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思想成为近代慈善救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李圭. 环游地球新录: 走向世界丛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274.
- [2] 张德彝. 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同治五年随蒲安臣志刚巡回出使欧美的见闻[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62, 91.
- [3] 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 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日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75.
- [4] 刘锡鸿. 英轺私记: 一个主张“用夷变夷”的人出国后的思想变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72.
- [5]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527.
- [6] 冯桂芬. 收贫民议: 显志堂稿, 卷11[M] //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中国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7] 钟叔河. 从东方到西方: 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404.
- [8] 赵树贵, 曾丽雅. 陈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04.
- [9]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551.
- [10]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 第6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6.
- [11]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7-65.

Analysis of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Ideas of Charity and Social Relief in Modern China

REN Yun-lan

(Institute of History,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After treaty por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became more frequent,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 strongly influenced modern China. Very early on gentry scholars and officials went abroad and learned about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welfare. They proposed new pioneering ideas which profoundly changed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bout charity and social relief. Chinese pioneers absorbed the idea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overty relief in modern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and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meaning and objectives of charity and social relief in China, thereby endowing Chinese char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public welfare. In particular, they established the charitable principles of educating and taking care of poor people and the idea that b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a prosperous country could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its population and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Keywords: pioneers; western ideas of charity and social relief; modern China